

現代學者晚年的寧靜	376
陳寅恪家族的“優美門風”	380
陳寅恪的學說為何有力量	383
錢鍾書的學問方式	391
社會變革中的文化制衡 對五四文化啟蒙的另一種反省	418
後記	435



## 引語

文化是鬆散的結構，內中充滿了張力。無窮無盡、川流不息的各種力量在相互牽拉、撕扯、撞擊、會通、融合。也可以說，文化是由多種元素構成的化分化合的綜合體，因不同元素之間的交錯互動，彼此相斥相激，而產生新的令人類歡愉的生命體。《易·繫辭》說的“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，此“生生”情形下的“易”之太極，不妨看做是對人類文化現象的哲學概括。

而在宋代思想家張載那裏，太極和“太和”為同一範疇的不同名相，所揭示的則是天下大道和天人之道所籠攝的無盡含藏：“太和所謂道，中涵浮沉、升降、動靜、相感之性，是生絪縕、相蕩、勝負、屈伸之始。其來也幾微易簡，其究也廣大堅固。起知於易者乾乎，效法於簡者坤乎。散殊而可象為氣，清通而不可象為神。不如野馬、絪縕，不足謂之太和。語道者知此，謂之知道；學易者見此，謂之見易。不如是，雖周公才美，其智不足稱也已。”<sup>[1]</sup> 原來“浮沉、升降、動靜、相感之性，是生絪縕、相蕩、勝負、屈伸”等無盡藏的對立物，都包含在太和之中。

然則太和或竟是文化現象的終極義指嗎？文化現象的諸種差異、分歧、周折、碰撞，歸根結底不過是人類的化跡不同而已。化跡不

[1] 張載：《張載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年，第7頁。

同，故路歧而有對，至產生懸隔。但走錯路的行者最終總要回來的。《紅樓夢》裏“智通寺”門旁的一副舊破對聯，不是已經發出了警語：“身後有餘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。”說開來還是《易經》繫辭裏的那句話：“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。”那麼當下熙熙攘攘，正在為急功近利、爾虞我詐、躁動不安而煎熬的人類，是不是應該早一點回頭是岸呢？“眼前無路想回頭”至少是末路的覺醒，如果是“不撞南牆不回頭”，就悔之晚矣。職是之故，孔子提出的“和而不同”和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”這兩條百驗不爽的理則，總沒有被人類拒而卻之的理由吧。

絕不是說傳統都是好的，禮教和習俗同樣是傳統的組成部分，很有一些禮俗已與今天的現代社會不相適應。中國社會的遷流和嬗變蘊蓄有各種可能。文化是流淌著的河流，變易以及相生相蕩相激，乃至改變河道，是文化的常態。但傳統是看不見的，也是割不斷的，只能通過歷時歷代積存的歷史故實和文化現象來辨識和感知。

2019年4月17日於京城之東塾



## 中國文化的張力

### ——傳統文化如何進入現代生活



中國傳統文化進入現代生活，是我們研究歷史文化的人一直以來的期待。但傳統文化是個龐雜的範疇，以前並不這樣籠統的標稱，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這一部分的內涵加以標稱。如經濟史、政治史、法律史、宗教史、哲學史、藝術史、文學史等，都是研究歷史文化的一個個具體領域，或一個方面。把傳統文化單標出來，是對傳統和現代做了一個區隔。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，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。曾經作為社會發展階段理論模式的“五種生產方式論”，學術界現在不再使用了。因為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，而且被稱為“封建社會”的階段，延伸有兩千多年，也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。那麼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，就社會形態而言，應該做怎樣的描述和區分呢？在一時找不到劃分的準確概念標識的情況下，先以傳統和現代做一個二分，是有道理的；儘管認真說來，對社會形態做這樣的大分隔，在學理上會有很多遺漏，不是學術研究的最可取的方法。

只就傳統文化來說，其內涵也是浩如煙海，寬博無垠。大量的文本典籍是傳統文化中非常突顯的部分。按傳統的典籍分類，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類，每一部的書籍都多到不知凡幾，汗牛充棟不足以形

容。而地上地下的文化遺存，更是多得無法計數。何況還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列。不過所謂傳統文化，其實就是傳統社會的文化，它們是能夠看得見、摸得到的那一部分我們祖先的智慧結晶。但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不是同一個概念，傳統文化背後的那個精神連接鏈，才是文化傳統。文化傳統是看不見的，它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的從古到今的人們的精神血液中。經過學者的研究辨析，用學術理念加以透視概括，可以發現其中包含著傳統文化得以構成和傳衍的規則、理念、價值和信仰。中國由於地域廣袤，歷史悠久，民間社會發達，不僅有儒家思想在漢以後成為文化的大傳統的代表，同時由於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狀態，又形成了根脈深厚的文化的小傳統。文化的小傳統主要指民間文化、民間藝術、民間禮俗和民間信仰。如果說儒家是在朝的思想形態，道家和道教、佛教思想，則是在野的思想形態。儒釋道三家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，它們化合而成的思想新質，成為傳統社會精神網絡恆久不懈的支撐力量。

傳統不是凝固的沉澱物，而是鬆散的相對穩定的結構。承載著歷史的惰性力而又不隨順時俗俯仰，是它天然生就的品格。但當異質文化之水悄然進入這條河流的時候，日積月累的結果，經過相遇相熟到彼此吸收溶解的過程，固有的傳統會因之增加或減少，直至發生變異。此時，傳統更新的歷史時刻就來到了。但更新不是廢棄自我主體，而是在舊傳統中增加了新養分和新資源。所以大文化史家陳寅恪先生說，即使吸收西方的思想，也不應忘記本民族的歷史地位。儒家學說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大傳統，由於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以來的佛教文化特別是禪宗思想的融入，產生了宋明理學，這是不同於先秦兩漢



儒學的新形態，思想史家稱之為新儒學。陳寅恪高度評價這一文化融會和思想合流的現象，認為是中國歷史文化的“一大事因緣”。而儒家思想吸收道教的思想，以及道教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，在唐以後更日趨明顯，終於形成儒釋道“三教合一”的歷史奇觀。追其緣由，主要是居於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，同時這也就是中華文化的包容性。《禮記·中庸》提出，治理國家有需要遵行的“九經”，其中的一“經”即為“柔遠人”，施行此一政策，能夠收穫“四方歸之”的效果。東漢的佛法東傳和明代的耶教來華，同為中華文化這一品格的見證；而漢唐兩世的繁榮昌盛，則為中華文化這一精神品格提供了歷史範例。所以王國維的《詠史》遙憶唐代的開放繁榮，寫下這樣兩句詩：“遠人盡有如歸樂，知是唐家全盛時。”清朝的道光、咸豐以後的歷史，所提供的則是這種精神旨趣反向的歷史見證。凡是不肯接受異質文化流來流去，甚至拒斥外部世界互動的時候，都是國家情況不是那麼美妙的歷史時刻。傳統是充滿活力而又充滿張力的文化綜合體，傳統不能割斷，世界不能脫離，應成為我們恆久遵循的法理軌轍。

文化的大傳統和小傳統是互為影響的，大傳統須通過和小傳統結合，來增加自己的輻射力；小傳統則有賴大傳統的思想凝聚與品質提升。傳統是從過去流淌到現今的精神河流，每個人都不自覺地站在傳統的延長線上。可是歷史的一定時期，社會的精英人物一起站出來反傳統，並且形成社會的潮流，傳統也會因之發生斷層。但時過境遷，人們又會自我反思，由反傳統轉變為自覺地接續傳統。近一百年以來的中國，就是這樣走過來的。現在又到了需要自覺地接續傳統和如何



讓傳統成為當代文化與社會建構的有益養分的歷史時期。傳統是通過各個歷史時期創造出來的文化典範來承載和傳承的。文本經典和典範性的文化遺存，裏面集中藏有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的密碼，文本經典的誦習和文物遺存的熏陶，不失為現代人接受和連接傳統的有效方式。和傳統的因子連接緊密的大文化人，包括大藝術家、大文學家、大哲學家、大學者，他們所具有的德範與風儀，和他們才華卓具的獨創性的藝文傑作，能夠起到為青年人提供精神模楷的作用。但並不是所有的藝文人物和他們的創造物，都能達致這一境界，那些沒有傳統文化的根基，只靠獵奇和追求時尚的作者不足語此。

這裏還須辨析傳統文化和國學兩個概念。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，不應該加以混淆。傳統文化如前所說，是一個涵蘊多重的極為寬博的範疇。所以章太炎稱之為“國故”，胡適之解釋為所有過去的歷史文化。而國學所涉及的，則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學術研究。20世紀20年代，胡適曾說“國學”就是“國故學”的省稱。但胡適的國學定義，並沒有被學術界所採納，甚至連“國故”一詞，也遺落到一旁無人問津了。當時學術界的共識，是認為國學就是中國的固有學術。所謂固有學術，指的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、兩漢的經學、魏晉的玄學、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學、宋代的理學、明代的心學、清代中期的樸學（以考據為中心的學問）等。這樣一來，國學便跟不同歷史時期的學術等同起來了。顯然經過如此定義的國學，只是一部分專業人士致力的領域，跟一般民眾沒有關係，甚至跟此專業領域以外的其他專業人士，也沒有多大關係。而且傳統學術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，如果認為國學是固有學術，那麼是指哪個歷史時間段的學術？傳統學



術就其主脈來說，既有儒家的學術，也有道家 and 道教的學術，還有佛學的學術。那麼是指哪一家的學術？以固有學術等同於國學，內涵和外延未免太過於寬泛了。而當一個概念的內涵過於寬泛時，概念本身的既定內涵就會流失。

所以1938年5月，當20世紀的一位第一流的大儒馬一浮先生，在浙江大學舉辦國學講座的時候，他給國學下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全新的定義。他說：“今先楷定國學名義。舉此一名，該攝諸學，唯六藝足以當之。六藝者，即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也。此是孔子之教，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，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。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，諸學不能該攝六藝。今楷定國學者，即是六藝之學，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，廣大精微，無所不備。”<sup>[1]</sup>馬一浮還說，“六經”是中國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態。六經裏面有兩個系統：一個是學問系統，一個是價值系統。學問系統是很煩難的，所以治經學歷來不易，只有少數專家才畢生沉潛其中。不僅是文本本身的問題，重要的是要有小學的基礎。由小學入經學，是古代治經的不二法門。所以清儒的口頭禪是“讀書必先識字”。但六經的價值系統則是面對所有的人的。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、核心價值，可以說都在六經。特別是誕生最早的《易經》，固然是無可否認的占卜之書，但它同時更是中國文化論理價值的淵藪。

近年我從以《易經》為代表的六經裏面，也包括後來作為十三經

[1] 馬一浮：《泰和宜山會語》，《馬一浮》第一冊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0頁。

組成部分的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經》裏面，梳理抽繹出五組價值理念：一是誠信，二是愛敬，三是忠恕，四是知恥，五是和同。最後的一組“和同”，就是孔子說的“和而不同”。“敬”是人的自性的莊嚴，即自尊、自重、志不可奪。孔子說的“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”的“志”，就是“敬”，就是不可易、不可被奪的人的自我精神的莊嚴。我認為“敬”是一個終極價值，已經進入了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。“恕”就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，亦即將心比心、換位思考，自己不喜歡、不希望的事情不強加於人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現已成為世界公認的道德金律。“知恥”是《禮記·中庸》裏的話，原文是“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”，並說知道這三者，就知道什麼是“修身”了。恥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不可或缺的從心理到生理的一種感受。所以做錯了事，說了不合適的話，有了失禮行為，會感到不好意思。孟子講的“四端”中的“羞惡之心”，就是“知恥”。按孟子的說法，如果沒有“羞惡之心”，人就是非人了。同樣，其他三“端”：惻隱之心、是非之心、辭讓之心，缺了哪一“端”，在孟子看來，也都不具備人的資格。所以我提出，“修身”應該從“知恥”開始。

“和同”指“與人和同”。世界上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，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大。所以不同的人，可以互相交流溝通；不同的文化，可以對話互闡，可以跨文化溝通對話。《易經》繫辭的兩句話：“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”，把“與人和同”的思想概括無遺。《易經》的“同人”一卦，則是“與人和同”思想的全方位演繹。說到底，傳統文化進入現代生活，最主要的是傳統文化中的這些具有永恆意義的精神價值。《周易》的文言有兩句話：“君子進德修業，忠信



所以進德也；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”試想，人生在世，何欲何求？無非是讓自己修為得更好些，並希望事業有成，使成就感給自己帶來快樂與榮譽。那麼“進德修業”四個字可以說將人生志業的全部要義概括無遺。而“進德”靠的是“忠信”，事業有成靠的是“立誠”。與人相處，則靠的是“和同”，即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即使不同，也可以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。所以我認為，一個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，一個是“和而不同”，是中國文化的大智慧，事實上給出了人類麻煩的解決之道。

六經中的這些價值理念，都是永恆的價值理念，永遠不會過時。正如熊十力所說，它們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精神依據。關鍵是需要讓這些價值論理跟現代人建立有效的聯繫，使之成為每個人精神血脈的一部分。所謂傳統文化進入教育環節，國學和教育結合，其精要之點，即在於此。價值教育是國學教育的核心，施行得體，可以補充百年以來施行的單純知識教育的不足。班固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裏說得明白：“六藝之文：《樂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詩》以正言，義之用也；《禮》以明體，明者著見，故無訓也；《書》以廣聽，知之術也；《春秋》以斷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，蓋五常之道，相須而備，而《易》為之原。故曰‘《易》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’，言與天地為終始也。至於五學，世有變改，猶五行之更用事焉。古之學者耕且養，三年而通一藝，存其大體，玩經文而已，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，三十而五經立也。”此段話的意思，一是說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“五常”之德，具在六經；二是說《易》的地位最不同尋常，“與天地為終始”，是其他五“藝”之“原”；三是說由《樂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



形成的五種專門學問，如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“五行”的更替一樣，在不同的世代會有不同的呈現。至於如何學習和研讀六經，班氏給出了“玩經文”的三字訣竅。“玩經文”的“玩”，是欣賞、玩味的意思，絕不含玩耍之義。就是反覆閱讀、反覆欣賞、反覆研習六經的文本，其結果必然是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。《易·繫辭上》所說的“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”，也是這個意思。並不需要逐詞逐句的背誦，能夠理解六經文本的義理精神、“存其大體”就可以了。而六經對於玩味誦習者所能夠發生的影響，也不在於日常的有用還是無用，主要是通過對六經文本的玩味、賞析、研習，受其熏陶，可以收到“蓄德”的效果。六經是德教之書，於此可以得到證明。

六經文本讀起來不無煩難，但《論語》事實上可以作為六經的簡要讀本，如同馬一浮所說，《論語》裏面有“六藝”，《論語》可以直接通“六藝”。孔子講的道理，其實就是六經的基本道理，只不過通過夫子的言傳身教，化作了日用常行，變得更為親切、近人、易入。這是“四書”中另外的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、《孟子》，猶不能與之相比並者。《論語》是中國文化寶藏的宏明正學的第一代表，絕對堪稱“思無邪”的傳世聖典。傳統文化進入教育，首先應該讓《論語》成為各級學校的教科書，先選讀，後全讀，分級分層，循序漸進，由淺入深。而且應該以誦讀白文（不加注釋的文本）為主，祈以幾十年、上百年之後，使之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。同樣，學習國學，我認為正途也應該從誦讀《論語》開始。

載 2017 年 3 月 15 日《中國文化報》

## 傳統的誤讀

我認為我們可能誤讀了我們的思想文化傳統。很久以前就誤讀了，現在還在誤讀。

不是個別的，甚至不是少數，而是相當多的研究者，過分誇大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所佔的位置，以致有的把儒家思想和整個傳統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來。這樣來看待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和社會，我以為是對文化傳統的一種誤讀。

不妨回顧、檢討一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

先秦時代，春秋戰國時期，是諸子百家爭鳴競放的時代，儒家只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，無所謂儒家中心。

秦朝，法家地位顯赫，因此才有焚書坑儒，更談不上儒家中心。

兩漢，西漢前期倡黃老之術，“霸王道雜之”。至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，儒家地位始有所改變。但董仲舒強調“天人感應”，引入漢代盛行的讖緯學說，試圖用陰陽五行的觀點詮釋儒家，實際上是自亂儒統，尊之適足以卑之。董仲舒的儒學，是變了味的儒學。漢代經學的地位高，儒家的地位並不如想象的高。所以，太史公的父尊司馬談作《論六家要旨》，對儒者有“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”之譏，而班固《漢書》之《司馬遷傳讀》，則以史遷之“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”為“蔽”。



至於東漢，佛教傳入，道教始興，剛剛確立但還不夠牢固的儒家地位，遇到了“異教旁門”的挑戰。

魏晉時期，那是王弼、何晏大出風頭，倡議“以無為本”，玄學盛行的時代。

南北朝，佛教大盛，道教方熾，儒家退為守勢。

隋朝和唐朝，特別是唐朝，那是個大文化時代，兼容並蓄，無所不包，但思想文化方面佔優勢的是佛家和道家，即使宗奉儒家的知識人士，也不忘兼採佛道以趨合時宜。

宋、明出現理學和心學，既是傳統儒家思想的發展，又是儒家思想的轉型與重構。準確地說，是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大匯流、大融合時期。周（敦頤）、張（載）、二程（程顥、程頤）、朱子的思想，雖宗奉儒家，實亦吸收了佛道“二氏”的養料。王陽明不用說，更有“解散”儒學的傾向。而有明一代，特別是明中葉以後，社會倫常鬆弛，李卓吾等反儒的思想家出來說話了。當時一般市民的生活，可以說與儒家正統思想格格不入，所以才有《金瓶梅》那樣的作品出現。

清朝，一開始打亂了傳統，後來又修補傳統。既尊儒，又奴儒、坑儒。號稱盛世的康、乾時期，在經濟上、軍事上、版圖上，是世界一流大國；文化上，則是十足的小國心態。反儒學潮流，在藝術與文學的創作中，得到了變相的發揮。《紅樓夢》以此，《儒林外史》以此。

幾千年來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，不是單獨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。歷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、昌明、活躍時期，都是各種思想競爭、融會、兼容、並立時期。這正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漢、唐文化所以令人神往，主要在於它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博大氣



象。漢代打開了西域的大門。唐代長安成為世界文明的交會地，西來東往，胡漢雜處，奇裝異服，一派繁盛熱鬧景象。

用中國文化精神培育出來的知識分子，往往把儒、釋、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無礙無隔。不是某一種單一的思想，而是各種思想的合力，鑄成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精神。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禁錮誠然是事實，但作為知識分子個人，反而保持相當大的思想活性。愛因斯坦提出的科學研究的內在自由和外在外在自由，就內在自由而言，中國文化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極其廣闊的空間。

中國文化對異質文化的吸納與消解能力，是無與倫比的。在中國版圖之內，各民族之間的融合，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劑。對世界各國文化，中國文化採取的態度是禮之、師之、納之、化之，如同孔子所說：“夷狄入中國，則中國之。”《易經》上說：“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。”又說：“物相雜，故曰文。”這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絕好概括。這種精神屬於中國文化整體。

問題是由於何種原因導致了對傳統的誤讀。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著眼，把思想文化與社會制度混為一談，是重要原因。制度雖然是文化的派生物，是一定文化成熟與否的標誌，但制度是暫時的，文化是永久的。制度，包括任何制度，都有其不完善性；文化的本性則追求完美，不僅屬於一個國家，而且屬於全人類。過時的制度可以推翻，但不能推翻文化。

文化傳統有斷而相續的特性，永遠割不斷。陳寅恪先生曾說：“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，最深最巨者，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，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，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



者。”<sup>[1]</sup>不愧是通史明變的大判斷，惜時人鮮有注意者。

總之破除儒家思想和整個傳統思想文化的同質同構的觀點，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區分開來，是兩個關鍵。在認知上解決這兩個問題，可以走向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正讀，並進而求得正解，為恢復和重建中國文化所固有的會通三教、兼容百家，無所不包括、無所不師承的博大而恢宏的精神鋪設條件。

此文係根據 1991 年 6 月 3 日在南京召開的“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二十一世紀”國際學術研究所做演講縮寫而成



[1] 陳寅恪：《馮友蘭〈中國哲學史〉下冊審查報告》，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252頁。

## 傳統與記憶

我有時想，人類實在是太傲慢了：要征服自然，要排壓另類，要改變別人，要篡改歷史。當然人類這種精靈是絕頂聰明的，不會承認自己時時在篡改歷史。我們只好換一個說法，提出人類真的知道自己的歷史嗎？或者說已經成為歷史的物事，人們還可以真實無誤地複製出來麼？不同民族的生活之鏈是可以結成各自的傳統的。但人類首先有忘記自己歷史的傳統。

《列子》裏講過一個故事，說宋國有一個叫華子的人，正值中年，得了一種忘病：“朝取而夕忘，夕與而朝忘；在途則忘行，在室則忘坐；今不識先，後不識今。”全家人被他煩擾得苦不堪言，四處求醫，均不見效。後來魯國一個儒生給他醫好了病。然而，如夢方醒的華子勃然大怒，又打孩子，又罵老婆，又趕儒生，說道：“曩吾忘也，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，今頓識，既往數十年來，存亡得失哀樂好惡，擾擾萬緒起矣。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。須臾之忘，可復得乎？”

錢鍾書先生《管錐編》卷論《列子》張湛注，在引據了這則故事之後，連類取比，又徵引西籍之相關者比較為說。一是古羅馬詩人霍拉斯寫的一個患了狂疾的人，此人坐在家裏，能憑空生出幻覺，看到男女角色在眼前搬演劇本，不禁擊節歎賞。經良醫治癒之後，他反而